

## 「全盤西化」Vs「中國本位」

### ——試論1930年代中國關於文化建設路向的論戰

◎ 何愛國

自五四運動到1949年以前，中國文化建設路向問題（或者說文化現代化問題）一直是困擾中國知識界和文化界的一個話題。「全盤西化」和「中國本位」之間的爭論就一直貫穿於這三十年的中國歷史中，其中30年代形成了一場大規模的論戰，其餘緒持續到1949年以前。這場論戰形成了關於中國文化建設路向獨特的視點和張力。圍繞文化建設，「全盤西化派」、「中國本位派」，「全盤西化的修正派」、「中國本位的修正派」、「左翼文化」、「新儒學」、「文化虛無主義」等展開了交鋒。交鋒的目的，按陳序經的說法，就是「求得相當的信仰」或「求得最低限度的共同信仰」<sup>1</sup>。交鋒的結果，確實達成了一定的共識，那就是中國社會亟需要的是現代化，包括科學化、工業化和民主化。「西化」和「中國化」的概念最終歸趨於「現代化」。當然，當時對現代化認識的深度很不夠，關注的主要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硬體」，對諸如「人的現代化」等「軟體」關注不夠，對現代化中所需要的「社會整合能力」顧及不周，對現代化的複雜性和艱巨性也沒有很清醒的認識，現代化思想尚未形成系統的理論。但對「西化」與「現代化」的分梳不能不說是一種長期論戰和實踐反思的成果。這來之不易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多元現代性思想在中國的萌現。而在西方，直到70年代以前，都是視「現代化」等同於「西方化」，尤其是「美國化」的經典現代化理論佔據絕對主流地位。現代化理論的修正派，或者說，新現代化理論，是在亞洲新興工業化地區崛起以後的一種深刻反思和理論認可。西方主流學術界開始承認「現代化」並不同於「西方化」是在70年代，而後伴隨著亞洲的進一步發展而不斷伸展其勢力。從世界的眼光來重新看待1949年以前的這場論戰，中國學術界對現代化理論的貢獻就非同一般。

#### 一 「全盤西化」或「充分世界化」

「全盤西化派」，又名「徹底西化派」，或「充分世界化派」（經胡適修正），簡稱「西化派」、「歐化派」、「西洋派」或「世界化派」。「統帥」是胡適，「先鋒」是陳序經。聲援他們的還有「察見中國全部的文化已不及全部西洋文化」、預期「中國全盤西化是可能的事」<sup>2</sup>的呂學海、主張「更深刻更廣泛地西洋化」<sup>3</sup>的梁實秋、主張「盡量西化」<sup>4</sup>的嚴既澄、主張「從基礎上從根本上從實質上西化」<sup>5</sup>的張佛泉、主張「大部分西化」或「現代化」<sup>6</sup>的張奚（熙）若，主張「全盤的吸取西洋文化之根本精神」或「西學為體，中學為用」<sup>7</sup>的熊夢飛等。除陳序經、呂學海等極少數人外，「西化派」的大多數都不主張「全盤西化」，但他們都主張「大部分西化」或「根本上西化」，與「全盤西化」並沒有甚麼本質差別。他們的主要輿論陣地是《獨立評論》。胡適的具體主張體現在：1929年在《中國基督教年鑒》發表

的〈中國文化的衝突〉，1935年3月31日在《獨立評論》發表的〈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和同年6月21日在天津《大公報》發表的〈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等。陳序經的具體主張體現在：1933年12月29日在廣州中山大學發表的演講〈中國文化之出路〉，1934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文化的出路》，1935年6月21日在天津《大公報》發表的〈全盤西化論的辯護〉等。

### （一）問題意識

胡適提倡「全盤接受現代西方文明」，不是沒有前提的。這個前提就是對中國現實問題的深切認識，而「全盤承受新文明」是胡適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方法。在胡適看來，「中國的問題是她在多種文化的衝突中如何調整的問題」，也就是「文化認同」的問題，而中國現在的一切麻煩「都可歸咎於在將近六十年間尖銳的文化衝突中未能實現這種調整」。由於「這個問題從未得到人們的充分認識和自覺對待，而只是被惰性、自大和表面的改良措施所避開和掩蓋」，結果，「中國今天對自己問題的解決仍像半世紀前一樣遙遠」。當務之急是「清楚地認識文化衝突這個問題的現實而予以解決」，解決的目標和關鍵是：「中國當怎樣自我調整，才能使她處在已經成為世界文明的現代西方文明之中感到安適自在。」胡適提出了三種可能的解決方案：第一種是「抗拒」，即「中國可以拒絕承認這個新文明並且抵制它的侵入」，不過，胡適認為這種態度「今天沒有人堅持」；第二種是「全盤接受」，即「一心一意地接受這個新文明」；第三種是「有選擇性的採納」，即「可以摘取某些可取的成分而摒棄她認為非本質的或要不得的東西」。胡適反對「選擇性現代化」，主張「接受性現代化」。理由是「選擇性現代化」最終「受惰性規律的自然作用」，從而成為「保守主義」的「庇護所」。<sup>8</sup>

陳序經同意胡適對中國問題的觀察，他也同樣認為「中國的問題，根本就是整個文化的問題」，從這種認識出發，陳序經認為：「想著把中國的政治、經濟、教育等等改革，根本要從文化下手。」可是，文化又如何下手呢？陳序經的分析是：「現在世界的趨勢，既不容許我們複返古代的文化，也不容許我們應用折衷調和的辦法；那麼，今後中國文化的出路，唯有努力去跑徹底西化的途徑。」<sup>9</sup>

### （二）中國文化建設路向：「全盤西化」或「充分世界化」

胡適把「現代西方文明」完全等同於「現代文明」、「新文明」或「世界文明」，主張「全盤接受」「已經成為世界文明的現代西方文明」，反對「有選擇性的吸納」。<sup>10</sup>針對吳景超和陳序經把他列入「主張文化折衷的一個人」<sup>11</sup>或「雖然不能列為全盤西化派而乃折衷派中之一支流」<sup>12</sup>。胡適強調說：「這個看法是錯誤的。我前幾年（1929年）曾在上海出版Christian Yearbook裏發表過一篇The Culture Conflict in China，我很明白的指出文化折衷論的不可能，我是主張全盤西化的。」他認為說「文化折衷」，說「中國本位」，「都是空談」，惟一的選擇就是「努力全盤接受這個新世界的新文明」。<sup>13</sup>

1935年6月21日鑒於潘光旦批評他在The Culture Conflict in China一文中混淆了「全盤西化」（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和「充分的現代化」，或「一心一意的現代化」，或「全力的現代化」（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的涵義，胡適對他的「全盤西化」的說法做了修正。他說：「我們不能不承認，數量上嚴格的『全盤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文化

只是人們的生活方式，處處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經濟狀況和歷史習慣的限制，這就是我從前說過的文化惰性。」<sup>14</sup>，「為免除許多無謂的文字上或名詞上的爭論起見，與其說『全盤西化』，不如說『充分世界化』。『充分』作數量上即是『盡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sup>15</sup>至於如何「充分世界化」，胡適的解釋是：「我們理想中的『充分世界化』，是用理智來教人信仰我們認清的大方向，用全力來戰勝一切守舊戀古的情感，同全力來領導全國朝著那幾個大方向走——如此而已。」<sup>16</sup>在這裏胡適實際上還是把「現代化」、「世界化」等同於「西方化」，不過認為說「西方化」有損「民族文化認同」<sup>17</sup>，況且在邏輯上和現實中都難以成立，因而不得不作出修正。

與胡適猶豫於「全盤西化」和「充分現代化」或「充分世界化」的概念之間，並最終採納了後者不同，陳序經是一個堅定的「全盤西化論」者，他沒有絲毫的猶豫，在與「本位建設派」和其他批評者的論戰中，他始終堅持「全盤西化論」。他反對「主張保存中國固有文化的復古派」，也反對「提出調和辦法中西合璧的折衷派」，他自稱是「主張全盤接受西洋文化的西洋派」，他說他特別主張的就是「中國文化徹底的西化」。<sup>18</sup>

### （三）持論理由

為甚麼中國必須「全盤西化」？胡適立論的依據是：

第一，「選擇性現代化」會「受惰性規律的自然作用」，從而實質上淪為「保守主義」的「庇護所」。「接受性現代化」則可以克服這種惰性，打破這種庇護。胡適理解的「選擇性現代化」是指「盡量保持傳統價值，而從西方文明中只採取那些適合現實迫切需要所必須的東西」。胡適指稱的「接受性現代化」則是指「全盤接受」或「一心一意接受」現代西方文明。胡適認為：「謹慎選擇的態度是不可能的，而且也實在不必要。一種文明具有極大的廣被性，必然會影響大多數一貫保守的人。由於廣大群眾受惰性規律的自然作用，大多數人總要對他們珍愛的傳統要素百般保護。因此，一個國家的思想家和領導人沒有理由也毫無必要擔心傳統價值的喪失。如果他們前進一千步，群眾大概會被從傳統水平的原地向前帶動不到十步。如果領導人在前進道路上遲疑不決、搖擺不定，群眾必定止步不前，結果是毫無進步。」胡適強調：一個國家的思想家和領導人「對現代文明採取唯一可行的態度，即一心一意接受的態度。」

第二，西洋的精神文明絲毫不亞於它的物質文明，這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而東方的舊文明恰才是「唯物」的文明，即「很少有甚麼精神性」的文明和「不人道」的文明。胡適對西方文明的看法是：「科學與民主的宗教二者均蘊育著高度的精神潛力，並且力求滿足人類的理想要求。甚至單純的技術進步也是精神的，它可以解除人類的痛苦，大大增強人類的力量，解放人類的精神和能力，去享受文明所創造的價值和成果。」西方文明「盡可能充分利用人類的聰明才智來尋求真理，來制服天行以供人用，來改變物質環境，以及改革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以謀人類最大幸福。」胡適高度地讚揚道，「這樣的文明，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至於「東方的舊文明」，胡適的評價極低，他說：「我公開譴責了東方的舊文明，認為它的『唯物的』，以其無能為力地受物質環境所支配，不能運用人類的智慧去征服自然界和改善人類生活。」胡適還強調，「容忍象纏足那樣的野蠻風俗達千年之久而沒有抗議的文明，很少有甚麼精神性」。

第三，中國的舊文明「不能解決貧窮、疾病、愚昧和貪污的問題」，「因為這四大禍害是中國舊文明殘存至今的東西」。

第四，現代化成功的日本「毫無保留地接受西方文明」的實踐是中國文明未來成功的參考。胡適以日本的西化實例為證，企圖找到一個可供中國借鑒的榜樣。他說：「由於極願學習和銳意模仿，日本已成為世界上最強國家之一，而且使她具備一個現代政府和現代化文化。日本的現代文明常常被批評為純粹是西方進口貨。但這種批評只不過是搔到事物的表面，如果我們以更多的同情態度來分析這個新文明，我們就會發現它包含著許許多多必須稱之為土生土長的東西。」正是「日本毫無保留地接受了西方文明，結果使日本的再生取得成功。」因此，「讓我們希望中國也可能象日本那樣實現文化復興」。<sup>19</sup>

陳序經堅持「全盤西化」主張的兩個理由是：

第一，「西洋文化，的確比我們進步得多。」陳序經認為，從文化發展上看來，西洋近代的文化的確比我們進步得多，它的思想也比中國的思想來得高。西洋文化無論在思想上，藝術上，科學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學上，文學上，都比中國的好。就是在衣、食、住、行的生活上頭，我們也不及西洋人的講究。即使是死的國學，也須賴西洋方法的注射，才能保其生存。在西洋文化裏面能夠找到中國文化的好處，反之，在中國的文化裏未必能夠找到西洋的好處。從比較上來看，中國的道德，不及西洋。中國人無論是公德還是私德都不好。西洋文化因它是由許多不同文化組合而成，所以中世紀的局勢，也比中國好。

第二，「西洋現代文化，無論我們喜歡不喜歡去接受，它畢竟是現代世界的趨勢。」陳序經認為，從理論方面說來，西洋文化，是現代的一種趨勢。一切政治，社會，教育，經濟，物質方面，精神方面，理論上和事實上，中國和非西洋國家，都無一而非漸趨於西洋化。從空間看去是如此，從時間看來也是如此。西洋文化，是不斷創新和發展的，從而成為現代化和世界化的。對著現代世界文化，雖欲不加以接受，亦會被迫著去接受，因為文化的趨勢是不可逆轉的。試看東鄰的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盡量地採納西化，結果便一躍而躋於富強之域，他們不僅種族因之而興盛，他們祖宗所遺下的文化也因之光榮。<sup>20</sup>

## 二 「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

「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派」，簡稱「中國本位派」、「本位建設派」或「本位派」，由「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的倡議者和聲援者構成。倡議者是發表「宣言」的王新命、何炳松、武培幹、孫寒冰、黃文山、陶希聖、章益、陳高備、樊仲雲、薩孟武等十位教授。聲援者包括主張「中西調和」<sup>21</sup>的穆超，主張催動中國舊文化的「老根」再發「新芽」<sup>22</sup>的張東蓀，主張「繼續新文化運動的精神」、「保存」和「採納」中國和西洋「優美文化」、「還要創造新文化」<sup>23</sup>的吳景超，主張「民族本位」<sup>24</sup>的陳石泉，主張「三民主義即中國本位之文化建設綱領」<sup>25</sup>的陳立夫，擁護「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反對「中國文化本位」的文化建設<sup>26</sup>的常燕生，強調要有一種「國民性之道德」精神<sup>27</sup>的太虛法師，認為「建設中國本位意識」是「建設中國本位文化」之「前提」<sup>28</sup>的劉絜敖，主張「破中求立」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sup>29</sup>的丁遙思，贊成「中國化」的「新啟蒙運動」<sup>30</sup>的張申府，主張「一切物質文化建設採用最新的發明，一切精神文化建設非有批評態度不可」<sup>31</sup>的李麥麥等。「本位派」的輿論陣地主要是《文化建設》。具體主張體現在王新命等十教授於1935年1月10日在《文化建

設》第1卷第4期發表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以下簡稱〈宣言〉）和同年5月10日在〈文化建設〉第1卷第8期發表的〈我們的總答覆〉（以下簡稱〈總答覆〉）兩文中。主要主張在〈宣言〉裏，〈總答覆〉是對批評派的回應和對〈宣言〉的補充。這次討論的成果結集為《中國本位文化建設討論集》。

### （一）問題意識

「本位派」認為，從發生了以解放思想束縛為中心的五四文化運動以來，中國人的思想遂為之一變。在文化的領域，我們看不見現在的中國了。中國在文化的領域是消失了。中國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的內容與形式，已經失去了它的特徵。由這沒有特徵的政治、社會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漸漸的不能算得中國人。所以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從文化的領域去展望，現代世界裏面固然已經沒有了中國，中國的領土裏面也幾乎已經沒有了中國人。要使中國能在文化的領域抬頭，要使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思想都具有中國的特徵，必須從事於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sup>32</sup>

### （二）中國文化建設路向：「中國本位」

「本位建設派」關於中國文化建設路向的基本主張是：必須用批評的態度、科學的方法，檢閱過去的中國，把握現在的中國，建設將來的中國。中國是既要有自我的認識，也要有世界的眼光，既要有不閉關自守的度量，也要有不盲目模仿的決心。這認識才算是深切的認識。循著這認識前進，那我們的文化建設就應該是：「（針對傳統）不守舊；（針對西學）不盲從；根據中國本位，採取批評態度，應用科學方法來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sup>33</sup>

基於批評派對「本位派」的質疑，「本位派」對他們的主張又作了進一步的補充。關於「何謂中國本位」，「本位派」認為：「我們所主張的中國本位，不是抱殘守缺的因襲，不是生吞活剝的模仿，不是中體西用的湊合，而是以此時此地整個民族的需要和準備為條件的創造。」

關於「何謂不守舊」和「何謂不盲從」，「本位派」的解釋是：「在縱的方面不主張復古，在橫的方面反對全盤西化，在時間上重視此時的動向，在空間上重視此地的環境，熱切地希望我們的文化建設能和此時此地的需要相吻合。」

關於「中國本位與中體西用的區別」，「本位派」認為，中體西用論者把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分成不可逾越的兩截，西方的物質文明，沒有靈魂；中國的精神文明，沒有軀殼。認為用中國的精神文明來支配西方的物質文明，那就是理想的湊合。而中國本位論則認為，物質和精神是一個東西的兩個方面，根本不能分離。說到體用，有甚麼體便有甚麼用，有甚麼用必有甚麼體。說中體西用，那簡直是不通！

關於「甚麼是中國此時此地的需要」，「本位派」的答覆是：「充實人民的生活，發展國民的生計，爭取民族的生存。」

關於「對於反帝反封建的態度」，「本位派」的回應是：「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是一種民族自信力的表現，一種積極的創造，而反帝反封建也就是這種創造過程中的必然使命。」<sup>34</sup>

### （三）持論理由

「本位建設派」從五個方面加以闡明和論證：

第一，中國有它地域和時代的特殊性，「所以我們特別注意於此時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國本位的基礎」。

第二，「徒然讚美古代的中國制度思想，是無用的；徒然詛咒古代的中國制度思想，也一樣無用；必需把過去的一切，加以檢討，存其所當存，去其所當去；其可讚美的良好制度偉大思想，當竭力為之發揚光大，以貢獻於全世界；而可詛咒的不良制度鄙劣思想，則當淘汰務盡，無所吝惜。」

第三，「吸收歐、美的文化是必要而且應該的，但須吸收其所當吸收，而不應以全盤承受的態度，連渣滓都吸收過來。吸收的標準，當決定於現代中國的需要。」

第四，「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是創造，是迎頭趕上去的創造；其創造目的是使在文化領域中因失去特徵而沒落的中國和中國人，不僅能與別國和別國人並駕齊驅於文化的領域，並且對於世界的文化能有最珍貴的貢獻。」

第五，「我們在文化上建設中國，並不是拋棄大同的理想，是先建設中國，成為一整個健全的單位，在促進世界大同上能有充分的力。」<sup>35</sup>

## 三 對「全盤西化」和「中國本位」的批評

「全盤西化」和「中國本位」兩論的出台與交鋒，引來了當時學術界、知識界和文化界的積極參與和密切關注。聲援者、同情者、批評者從不同的程度和層次上介入了這場大論戰。

### （一）對「全盤西化」的批評

聲援「全盤西化派」但又不完全同意「全盤西化論」的學者、「本位派」、「左翼文化」、「新儒家」等，都從不同的視角對「全盤西化論」展開了批評。

#### 1 「本位派」的批評

「本位派」對「全盤西化」的批評觀點可歸納為如下幾點：

第一，「全盤西化」論者認為中國固有的文化縱有可存，也不應存，西方文化縱有可舍，也不應舍。完全抹殺和唾棄中國文化，全盤接受和照搬西洋文化，不加以分析，這是不成話的主張。

第二，「全盤西化」論者蔑視中國的國情。適於國情且合於需要的文化，在乎相互調和，但是，「全盤西化」收不到調和的效果。

第三，「全盤西化」將失去對社會的整合。一國文化乃是數千年繼續的創造品，是民族和社會認同的保證，「全盤西化」突然把舊的文化基礎打倒，而新的文化基礎又決非一時所能創立，所以免不了思想的陷於失去中心和釀成社會的混亂。

第四，中國今日民族的出路，根本在於民族性的改良，中國民族性的弱點若不改進，雖然實行「全盤西化」，也不能把西洋文化消化，變成自己的東西。<sup>36</sup>

## 2 「左翼文化」的批評

「左翼文化」論者對西化派有一定程度的同情理解，如嵇文甫就認為，「全盤西化論」，對於「國粹論」，也就是對於中國傳統的舊文化，才正式的來個「突變」，來個「全盤否定」。所謂的「西化」，正確地說，應該是「現代化」。因為無所謂中西文化的差異，在本質上，乃是中古文化和現代文化的差異；不過前者帶上些中國的特殊色彩，而後者帶上些西洋的特殊色彩而已。我們要「現代化」，自然免不了要借徑西洋。可是一說要「全盤西化」，那就使中國要依附於西洋，甚麼都是西洋的好，而中國也將不成其為中國了。這正是中國社會半殖民地性的反映，而「全盤西化」之不贖人意，也正在於此。為著克服「全盤西化論」的依附性、半殖民地性和機械性，為著使中國現代化運動更加深化、醇化和淨化，於是乎有「中國化」認為，中華民族的新文化，決不是完全抄襲外國文化的所謂「全盤西化」。外國文化中的反動文化，如主張侵略，反對民族解放，主張獨裁和法西斯主義，反對民主和自由，主張宗教迷信，反對科學真理，擁護壓迫剝削，反對大眾，反對社會主義等，是我們應該排斥的。而「全盤西化」論者，卻正在把這類反動文化，大量輸入中國。<sup>37</sup>

## 3 聲援者（「全盤西化論」的修正派）的批評

嚴既澄、張佛泉、張熙若、梁實秋、熊夢飛等人對「全盤西化論」都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聲援，但他們認同「西化」，卻不完全同意「全盤西化」，在聲援的同時，也對「全盤西化論」作了程度不等的批評和修正。

主張「從根上西化」張佛泉主要從作為現代化的理想、目標和文化社會學的視角對「全盤西化論」者進行了批評。第一，張佛泉認為以「全盤西化」作為現代化的理想是不能完全達到的。若接受了文化的「自然折衷」論<sup>38</sup>，同時就須承認「全盤西化」不是可以完全實現的理想。第二，張佛泉反對「全盤西化」論者否認人對文化的選擇能力，反對關於「文化不能隨意地取長去短」，或者說，「文化單位不可分割」的觀點。如果採取旁人的文化必須是「批發」的，而不是「零售」的，是取其一端，就必須取其整體的，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那麼接受文化豈不倒變成了極簡單的一件事情嗎？文化既是這樣機械（或者說是這樣有嚴密的組織）的，豈不是只學會了其中的任何一樣，便立刻可以得到其整個文化了嗎？若說文化是近乎有機體的，是有系統的，可以講得通，若說文化絕對沒有單位可分，而不能單獨採納某一部分，則未免又是忽略了具體的事實。第三，張佛泉反對「全盤西化」論者否認文化選擇的「批判性」和「輕重緩急」問題。若以全盤西化為目前努力的目標，也含有可能的錯誤。西化不必以全盤形式，而是有選擇的。我們既不能任憑大眾渾渾噩噩地作無計劃無意識的胡亂模仿，也不能突然在各方面總動員地採納西方文化，更不能完全平均地接受西方文化，因此不能回避「選擇性」、「批判性」和「輕重緩急」諸問題。陳序經先生的「全盤西化」論被人指責為「皮毛西化」或「籠統西化」，不是沒有原因的。<sup>39</sup>

主張「大部分西化」的張熙若認為「全盤西化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有兩個極不妥當的地方。從理論上來看，第一，張熙若與張佛泉一樣，反對陳序經的「文化單位是分不開的」的命題，張熙若稱其為「單位定命論」。「單位定命論」否定了文化的複雜性和可選擇性，是一種「根本不通」的「無謂爭辯」的問題。第二，張熙若認為「全盤西化」論者以為「西洋甚麼都好中國甚麼都要不得」的觀點犯了一種很重大的嫌疑，就是：他們似乎對於西洋和中

國的文化都沒有充分的認識和深確的了解。從實踐上來看，第一，張熙若認為「全盤西化」難以實行。因為「西洋」二字代表一個極端複雜的東西。除過自然科學，工業，許多學術，及思想方法外，屬於所謂社會科學範圍以內的事情，就是西洋，也是矛盾衝突的，沒有確定的標準，不易仿效的。既然沒有「鐵板一塊」的「西洋」，那麼，仿效哪個「西洋」呢？第二，張熙若堅決反對「全盤西化」論者對民族認同和民族自尊心的傷害。張熙若強調，「民族的自尊心是不應該打倒的，民族的自尊心是不應該動搖的。」「全盤西化」論者輕易地否定中華民族的一切傳統文化，恐怕由此帶來的後果是連學習西方的勇氣也喪失了。自大心是不可有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卻是絕對離開不了的，盲目的保守固然危險，隨便亂化也是笑話。一個民族的歷史有時是要那長期的眼光去看的，一時的不如人不能證明是永久的劣敗。<sup>40</sup>

梁實秋主張「更深刻更廣泛地西化」，但反對「全盤西化」。他說，「全盤西化」是一個不幸的籠統名詞，因為似乎是認定中國文化毫無保存價值，這顯然是不公平的。我們若把文化分析成若干部門，我們就可發現：（1）有中國優於西洋者；（2）有西洋優於中國者；（3）有不必強分優劣而可並存者；（4）此外更有中西俱不高明而尚有待改進者。不過，話又說回來，梁實秋對中國文化的優秀部分並不看重，也沒有興趣去進行嚴格的分梳和真正的繼承。他籠統地說：「我可以挑刺地說，中國文化裏有甚麼東西可以值得令我們誇耀於西方？中國此時此地有甚麼需要是西洋文化所不能供給，或不能作為參考？」如何「充實人民的生活」，如何「發展國民的生計」，如何「爭取民族的生存」，沒有一樣不可效法西人，沒有一樣我們能夠完全拋開西方的成規而另外創造出新的辦法來的，我們不能超越西洋文化的現階段而另外創造出更高的文化來，我們的道路僅僅是「急起直追」。<sup>41</sup>

#### 4 其他反對者

賀麟反對「被動」地「西化」或「全盤西化」之說，主張「張揚民族文化精神」又「得西洋文化體用之全」的「化西」工作。他尤其強調，「全盤西化」論者強調的「全盤西化」往往指的是「全盤科學化」，而「全盤科學化」不得謂為「全盤西化」，科學是人類的公產，即使其原本來自西洋文化，也不過是西洋文化的一部分。他認為，我僅主張對於各種理論之體與用，之全套，之源原本本，加以深刻徹底了解，而自己批評地創立適合民族生存時代需要之政治方案。此種方案乃基於西洋文化之透徹把握。民族精神之創進發揚，似不能謂之西化，更不能謂之全盤西化。且持數量的全盤西化之說，事實上理論上似均有困難。要想把西洋文化中一切的一切全盤都移植到中國來，要想將中國文化一切的一切都加以西洋化，事實上也不可能，恐怕也不必。而且假如全盤西化後，中國民族失掉其民族精神，文化上中國淪為異族文化之奴隸，這當非提倡全盤西化之本意。但假如中國人有選擇和創造的能力，與西洋文化接觸後，中國文化愈益發展，民族精神愈益發揚，這不能算是西洋化中國，只能說是中國化外來的一切文化。所以我根本反對被動的「西化」，而贊成主動的「化西」，所謂「化西」，即是主動地自覺地吸收融化，超越揚棄西洋現在已有的文化。但須知道這種「化西」的工作，是建築在深刻徹底了解西洋各部門文化的整套的體用之全上面。固然，我承認中國一切學術文化工作，都應該科學化，受科學的洗禮。但「全盤科學化」不得謂為「全盤西化」。一則科學乃人類的公產，二則科學僅是西洋文化的一部分。<sup>42</sup>

葉青對「全盤西化論」給予了最猛烈的抨擊。他認為「全盤西化論」是「思想界投降帝國主義論，是文化的殖民地化論」，從而給「全盤西化論」予以全然否定。葉青把西方對中國的侵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奪我們的市場」，歐美是也，主張把中國變成「經濟的殖民



地」；第二類是「奪我們的土地」，日本是也，主張把中國變成「政治的殖民地」；第三類是「奪我們的精神（人心）」，「全盤西化派」是也，主張把中國變成「文化的殖民地」。比較得失，葉青認為第三派「最兇猛」。葉青把胡適、陳序經、梁實秋等看作是「全盤西化派」的代表。「全盤西化派」主張「模仿」，否認「創造」，胡適公然認為「模仿就是創造」、陳序經也認為「全盤西化」即是「全盤模仿」，梁實秋詆「創造」為「誇大狂」。葉青認為他們講的並不是「文化啟蒙」，而是「文化投降」。指認他們為「帝國主義的洋奴買辦」。葉青主張後進國在文化上要趕超先進國，只有「從歷史的尖端出發」，即拋棄「西洋文化——資本主義文化——帝國主義文化」，創造社會主義新文化。<sup>43</sup>葉青對西洋文化持全盤否定的態度，有失辨證唯物論的批判鋒芒，涵有明顯的文化虛無主義之意。

## （二）對「中國本位」的批評

### 1 「西化派」的批評

「西化派」對「中國本位」的批評觀點歸納如下：

第一，文化自有一種「惰性」，全盤西化的結果自然會有一種折衷的傾向。現在的人說「折衷」，說「中國本位」，都是空談。此時沒有別的路可走，只有努力接受這世界的新文明。全盤接受了，舊文化的「惰性」自然會使它成為一個折衷調和的中國本位新文化。若我們自命做領袖的人也空談折衷選擇，結果只有抱殘守缺而已。古人說：「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風斯下矣。」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們不妨拼命走極端，文化的惰性自然會把我們拖向折衷調和上去的。<sup>44</sup>

第二，「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不過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最新式化裝，也正是今日一般反動空氣的最時髦的表現。他們的根本錯誤在於不認識文化變動的性質。文化本身是保守的。凡兩種不同文化接觸時，進步的文化可以摧陷落後的文化的保守性與抵抗力的一部分。其被摧陷的多少，其抵抗力的強弱，都和該文化的自身適用價值成比例；最不適用的，抵抗力最弱，被淘汰也最快，被摧陷的成分也最多。在這個優勝劣汰的文化變動過程中，沒有一種完全可靠的標準可以用來指導整個文化各方面的選擇去取，「本位派」夢想的「科學方法」是不存在的。文化激烈變動終有一個大限度，就是終不能根本掃滅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這就是「本國本位」。至少一國「空間時間上的特殊性」是永能保存的。<sup>45</sup>

第三，「西化派」反對「本位派」的「文化民族論」和「國家有機體論」，認為民族文化不等於國家，民族文化之興起，不等於國家之強盛，同樣，民族文化之衰亡，也不等於國家之衰亡。「本位派」以為只有保持住中國文化特色才足以立國，才足以與各國抗衡，是不合邏輯的誤念。如果以我們十足的整個的舊文化不足與西方文化抗衡，保持了原來文化中的某部分反能以之退敵嗎？並且文化之高低與國家之強弱不一定要有正比的關係。歷史上已經有許多文化高的民族被較不開化的民族征服的例子。至若目前中國所遇的情形，國既弱，而文化卻又不如人，偏妄想籍保持舊有文化來維護民族生命，很明顯的只是一種欺人欺己之談。為講邦國主義（Nationalism），為激發國民的自信心，不一定必須主張保持原有文化。這是兩回事。一方面徹底採取西來文化，一方面也可以對自己有極大的自信力。日本簡直就正在這樣幹。<sup>46</sup>

第四，「本位派」叫嚷中國應該「創造新文化」，這一類的话如果不完全是沒有意識的最多

也不過是犯了夜郎的誇大狂。處在今日，步人的後塵尚望不及影子，還提甚麼「並駕」，甚麼「齊驅」，甚麼成為「一支最強最勁的生力軍」。即使這是將來可能的，然而我們現在也不能必存這種期望。在今日整個中國的被人騎在了脖子上面喘不過氣來的時候，卻偏想對世界文化有甚麼「最珍貴的貢獻」。真成了最無聊的compensation。國人的毛病乃是襲取皮毛，並非是全都盲從。現在「洋化」只嫌不夠深刻不夠廣泛，離「反客為主」的地步還遠得很。「中國本位文化建設」運動在此時此地發生，是最不合於「此時此地的需要」。<sup>47</sup>

第五，「本位派」所謂的「中國本位」等於「中國此時此地的需要」，而「中國此時此地的需要」，又等於「充實人民的生活，發展國民的生計，爭取民族的生存。」這就等於取消了「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而代之以「二民主義」的獨裁文化。「本位派」在顧及「此地」的需要下，不主張「全盤承受」資本主義文化，也不主張「全盤承受」社會主義文化。「本位派」已經明白表示「反帝」，也明白表示不能模仿蘇俄。「本位派」的結論是：可以承受資本主義文化，而不承受到帝國主義的階段；可以承受社會主義文化，而不承受到共產主義階段。「中國本位文化」之較為簡單淺顯的解釋為：不同於德、意的，中國的，「獨裁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文化。更較簡單淺顯的解釋為：「二民主義」的文化。<sup>48</sup>

第六，民族本位文化之根本上不易確定，並無法建設。任何民族的文化成分都是複雜的，民族本位文化無從認定。我們從血緣上、政治上來看，各民族顯然有種分別，若從文化上看，就不能不說國際性多於民族性。中國固有的文化並非全是地道土產的，至少包含有印度文化、西域文化和回教文化等外來成分，晚近又有西方文化。不獨中國文化內涵複雜，就是西洋文化也就不一定是歐人或亞利安人的特產，西洋文化中的文字、宗教、陽歷、計數字、羅盤針、火藥、印刷、造紙等，都是外來的。<sup>49</sup>

## 2 「左翼文化」的批評

「左翼文化」論者如嵇文甫、張聞天等對「文化中國化」和「中國本位文化」作了區別。嵇文甫把「中國本位文化論」看作是一種「文化投機」行為，認為「中國本位文化論」產生於一個時代的逆流中，它是在漂亮辭句的掩飾下，向這逆流暗送秋波的。它反對「全盤西化論」，同時又不是「國粹論」和「中體西用論」。儘管和「文化中國化論」很相似，但它宣稱要創造既不是古代的，也不是西洋現代的「新文化」，這個「第三種文化」和所謂「中國化」之不同，乃在於它的非世界性和非現實性。「文化中國化」乃是把世界性的文化「中國化」，這「化」了的東西，雖然帶上些中國味道，但本質上仍是世界的。至於所謂「中國本位文化」，卻是中國所獨有，和西洋文化有本質上的不同。換句話說，「本位派」只看見文化的民族性，卻沒有看見文化的世界性，他們不能把兩者辨證地統一起來。在這一點上，他們比起「國粹論者」和「中體西用論者」，不見得進步多少。再者，「文化中國化」只是就現實所有的，中國民族正在吸收著的、世界性的文化，咀嚼消化，使這種文化在中國民族中發榮滋長，放出異樣的光彩。它並沒有像「中國文化本位論者」那樣的野心和幻想，要超出古今中外，劈空另創造出一種「新文化」來。不過，嵇文甫還是肯定了「中國文化本位論」對「文化中國化」的催生作用。他認為「中國文化本位論」雖然缺少歷史實踐性，可是這恰像基督未出世以前，先有許多「假先知」出來作他的前驅一樣，這個投機性的「中國文化本位論」也竟替現實的「中國化運動」作了一個預兆。<sup>50</sup>

張聞天與胡適一樣，也認為所謂「中國本位文化」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沒有甚麼本質區別，「中國本位文化」不過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最新表現而已。所以，中華民族

的新文化，也決不像「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中國本位文化」論者那樣，只吸收外國的自然科學，來發展中國的物質文明。它要吸收外國文化的一切優良成果，不論是自然科學的、社會科學的、哲學的、文藝的。而「中國本位文化」論者，卻正在以中國的陳舊的、保守的、落後的思想，反對外國先進的、革命的思想。外國文化的「中國化」，不是甚麼「中國本位文化」，而是使外國文化中的一切優良的成果，服從於中華民族抗戰建國的需要，服從於建設中華民族新文化的需要。這即是以最先進的科學理論和科學方法來研究中國的實際，幫助解決中國的各種實際問題。這不但能夠將中華民族的新文化提到更高的階段，而且也將使它給世界文化以極大的貢獻。<sup>51</sup>

### 3 聲援者（「中國本位」的修正派）的批評

聲援「本位派」的有張東蓀、吳景超、陳石泉、陳立夫、常燕生、劉絜敖、丁遙思、張申府等人，他們對「本位派」的觀點在既支援，又有所保留的基礎上又作了不同程度和角度的新的詮釋和擴充。而這種詮釋和擴充其實是對「本位派」觀點籠統含混的批評。

吳景超反對「本位派」抽象地談保存中國固有的優美文化，他說，抽象地談保存中國固有的優美文化，對於建設，絲毫無補，反而可以使一般人的思想混亂，無所適從。吳景超認為「本位派」今日的急務是做好三件具體的工作。第一，繼續新文化運動的精神，重新估定舊文化各部分的價值，要具體地研究和討論，不要抽象地空談。第二，指出在西洋文化中，那部分應當採納，能夠採納。所謂「應當」，是指價值而言；所謂「能夠」，是指我們的能力而言。第三，在建設的過程中，不但要保存中國的優美文化，及採納西洋的優美文化，還要創造一種新的文化，來適應新的環境，或滿足新的要求。<sup>52</sup>

陳石泉明確表示支援「以民族為中國文化建設之本位」，並把文化建設的重要意義提升到「國家政治經濟一切建設的導線」地位。他認為，中國文化建設必要的條件和最大的原則是：（1）銷除以往的精神和物質兩立的成見；（2）應以民族為中國文化建設之本位。在此基礎上，要以科學方法檢討過去文化運動的錯誤，對西洋文化取其所當取，並要「迎頭趕上去」，對中國舊有文化存所當存，且要「從根救起」，積極地注重發揚四大精神和消極地注意破除四大觀念。應該積極發揚的四大精神是：「民族精神」、「統一精神」、「創造精神」、「科學精神」。需要逐漸破除的四大觀念是：「封建觀念」、「奴隸觀念」、「利己觀念」和「階級觀念」。陳石泉強調，文化的本質是應付時間和空間以求生存進化的成績。「文化建設」為國家政治經濟一切建設的導線，未有文化低落或腐敗的國家，能夠在世界上繁榮滋長的。<sup>53</sup>

常燕生表示擁護「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而反對「中國文化本位」的文化建設。他對「中國本位」的解釋是：一切文化建設都須以中國這個國家有機體的利益為前提。有利於中國的文化，無論是國粹或歐化都應該保存接受，有害於中國本身的組成和發展的，無論是國粹或歐化都應該打倒拒絕。常燕生認為應該打倒的中國傳統文化包括：儒家的家族主義思想，道家的個人主義思想，佛教的出世思想等。他反對「中國文化本位」，認為中國固有文化不見得都有保存的價值。他認為當今「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的應該特別關注的事項有三：第一是近代國家意識的養成；第二是培養集團鬥爭的精神；第三，趕快完成近代國家的有機組織。只有進行「國家本位」的文化建設，中華民族才能夠繼續生存發展。否則，大家只有準備在墳墓裏相見，讓鬼魂們去討論「保存國粹」和「全盤西化」的問題罷！<sup>54</sup>

劉絜敖對「中國本位」的解釋與常燕生一樣，強調「事事以中國利益為前提」。所謂的「中

國本位文化」，就是「在中國的利益前提之下，以從事於文化活動」的意義。劉絜敖批評「本位派」雖然將「中國本位」四字標出，但未加以具體的解釋，所以使人捉摸不定。他說他一向對於一切事物都是主張「中國本位」的。不過劉絜敖認為在建設「中國本位文化」之前，要先建設「中國本位意識」，否則，一切都歸於白費。他再三致意的是「中國本位意識」的建設。他強調，「沒有本位意識，是絕對不可於外來文化接觸的！」如何建設「中國本位意識」呢？劉絜敖主張要從事三種工作和具備兩種覺悟。這三種工作就是：第一，「自己認識工作」。就是徹底地檢討中華民族的優點和缺點以及固有文化的特質所在，以明瞭自己是一個甚麼東西。第二，「認識他人工作」。就是要盡量探索歐美各強的實情和全世界是一個甚麼情狀。第三，「比較認識工作」。就是要多多研究各民族各文化過去的盛衰興亡史實，發現其所以興盛所以衰亡的因果法則，以衡量我民族我文化的生存能力，並資我民族我文化的借鏡與警惕。我們還要具備的兩種覺悟是：第一，對外來民族及其文化的防範和警惕意識；第二，獨立自強意思。有了「中國本位意識」，「中國本位文化」建設才算開始。但由於「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的至繁至難，又關切國家民族的命運，劉絜敖主張「全體文化動員」。<sup>55</sup>

丁遙思認為「中國本位文化建設運動」不是空穴來風，一個甚麼運動的發生，都有其必然的因素在內。「中國應當有本位的文化建設麼？」發出這樣懷疑的人，是把目前的文化建設看得異常單純和孤立，無疑他們是忽略了「文化」背後還有社會經濟的決定意義。所以我們處理一個既已發生了的問題，不應該對於該問題發生能否存在的懷疑，而應該對於該問題實行批判和檢討的工作。因此，目前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問題，當然也不是能否建設的問題，而是如何建設和怎樣建設的問題。丁遙思肯定「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但丁遙思對於十教授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提出了三點商榷意見。第一，對於反對資本主義文化和封建主義文化的問題，「宣言」並未特殊指明，只是異常含混地作了一篇學究式的解說。沒有從「破」中去求建設，忽視了文化上的戰鬥性。第二，沒有明白指出應該建設甚麼樣的文化，而只是在那兒喊些「不守舊」「不盲從」的口號來。從而使「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運動」成了一種沒有目標的運動。第三，「中國本位文化」，它的正確的解釋應該是：適宜於現中國的需要，及有利於其發展的文化。丁遙思既反對建設資本主義文化，也反對建設封建主義文化，主張建設三民主義文化。他特別指出：未來的啟蒙運動，其性質應該是非資本主義的民族資本主義性的文化。建設中國本位的文化，最主要的目的或最終的目的是要達到社會主義文化。<sup>56</sup>

#### 4 其他反對者

賀麟表示，我們無法贊成「中國本位文化」的說法。因為文化乃人類的公產，為人人所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藏，不能以狹義的國家作為本位，應該以道，以精神，或理性作本位。換言之，應該以文化之體作為文化的本位。我願意提出以精神或理性為體，而以古今中外的文化為用的說法。以自由自主的精神或理性為主體，去吸收融化，超越揚棄那外來的文化和以往的文化。我們不僅要承受中國文化的遺產，且須承受西洋文化的遺產，使之內在化，變成自己活動的產業。特別對於西洋文化，不要視之為外來的異族的文化，而須視之為發揮自己的精神，擴充自己理性的材料。那入主出奴的「東西文化優劣論」，那附會比擬的「中西文化異同論」，現在都已經成為過去了。不管時間之或古或今，不論地域之或中或西，只要一種文化能夠啟發我們的性靈，擴充我們的人格，發揚民族精神，就是我們需要的文化。我們不需狹義的西洋文化，亦不要狹義的中國文化。我們需要文化的自身。我們需要真實無妄、有體有用的活文化和真文化。凡在文化領域努力的人，他的工作和使命，應不是全盤接受西

化，也不是殘闕地保守固有文化，應該力求直接貢獻於人類文化，也就是直接貢獻於文化本身。<sup>57</sup>

## 四 「現代化」共識的養成

### （一）「西化派」的異變

「西化派」在與「本位派」的論戰過程中，吸收了「本位派」的合理內核和中肯的批評意見，對「全盤西化」進行了不斷的反思和自我批評，逐漸地由「全盤西化」趨向於「現代化」。

張熙若主張中國今日大部的事物都非「現代化」，或「西化」不可，這是凡有現代智識現代眼光的人都承認的話，而且也都在個人所能的範圍內努力實現。不過，張熙若認為「大部分西化」和「全盤西化」是有極大的差別的。因為文化不全是量的問題，也有質的問題。若是所餘的百分之一的價值很大，關係很重，那就不能因為它在量的方面只佔百分之一就把它抹掉。我們熱心現代化是天經地義，除過在黑暗中冥行的人們外，沒有人不贊成的，但是我們不要因為熱心提倡現代化而引起不必有的糾紛和無謂的爭辯。關於「西化」，張熙若的看法是：（1）現在完全受科學支配的事情自然應於最短期間極端西化；（2）應該全受科學支配而現在尚未如此的事應努力使它盡量西化；（3）將來是否能完全受科學支配現在尚有疑義的事，可以西化，也可以不必西化。張熙若認為「現代化」與「西化」是有根本區別的，今日中國的大部分事物都應該「西化」，而一切事物都應該「現代化」。所謂「西化」，差不多是抄襲西洋的現成辦法，有的加以變通，有的不加變通。所謂「現代化」則有兩種：一種是將中國所有西洋所無的東西，本著現在的智識、經驗和需要，加以合理化或適用化；另一種是將西洋所有但現在並未合理化或適應的事情加以合理化或適用化。張熙若眼中的「現代化」基本上等同於「合理化」或「理性化」。若是有人願拿「現代化」一個詞來包括「西化」，那當然也可以，不過不要忘記：「現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而「西化」卻不能包含「現代化」。由此看來，張熙若是把西化或西方現代化模式僅僅看作現代化模式中的一種。這種思想在當時是一種非常大膽和可貴的思想。就是今日看來仍然有某種振聳發聵的價值。張熙若認為中國的現代化要在以下四方面特別努力：第一是發展自然科學，這是現代文化的根本基礎；第二是促進現代工業，這是現代國家生存的基礎；第三是提倡各種現代學術，這是成為一個現代國家的基礎；第四是思想方法和態度方面的科學化，這是成為現代人的基礎。張熙若強調思想方面的現代化與事實同樣重要或者更重要。<sup>58</sup>

陳序經認為「本位」與「西化」的論戰在於求得「最低限度的共同信仰」或「相當的共同信仰」，他覺得沈昌燁主張的「大膽地採納整個西洋文化」、胡適主張的「充分西化」或「充分世界化」、嚴既澄主張的「盡量西化」、張佛泉主張的「根本西化」和吳景超主張的「大部分西化」，與他的「全盤西化」並沒有多大程度的區別。而且陳序經發現在論戰過程中不少原本對西洋文化抱有偏見的人對於西洋文化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和進一步的承認，如張佛泉在《國聞周報》第12卷第9期發表〈關於整個教育目標問題〉一文裏，以為「主張全盤西化的，多半要受到嚴峻的攻擊」，可是後來他自己卻不顧到這種「嚴峻的攻擊」，而「與全盤西化論以非常同情」。又如嚴既澄在十餘年前的「東西文化論戰」裏，在《民鐸雜誌》第3卷第3期發表〈評〈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以為「東西文化，不但有調和的可能，並且是非調和不可」，現在他卻極力主張全盤西化。胡適、嚴既澄、吳景超等不主張「全盤西化」的

「西化派」都不約而同地主張使用「現代化」這個詞來取代「西化」，陳序經則認為「現代化」、「世界化」等詞容易被守舊派所利用，他主張還是用「全盤西化」才不會給守舊派可資利用的空間。從這裏可以看出陳序經後來使用「全盤西化」這個詞更多的可能是一種對付守舊派的策略。因為陳序經發現居然有守舊派指責「本位派」太過西化。<sup>59</sup>

嚴既澄認定「西化」其實就是「現代化」，而「現代化」也就是「西化」，「現代化」與「西化」完全等同，沒有甚麼區別。如今世上的一切學問、智識、文物、制度均已成為世界的公器了，我們既為人類的一部，又何必為了所居地點的關係而妄為區別，把人類劃分成東西兩部。不過「西化」這個名詞頗不適當，而且很容易引起國粹主義者的反感，嚴既澄認為最好把它改為「現代化」；「全盤」兩字也容易引起誤會，最好也改為「盡量」二字。嚴既澄反對「本位派」的「審慎選擇」說，力主「盡量西化」。但嚴既澄又認為人家各國所同有的叫做「通性」，我們所獨有的叫做「特性」，我們如今所當作的事是就是要努力習得人家的通性，而後以此來保守我們的特性。嚴既澄在此似乎認為現代化既有通性的一面，也有特性的一面。承認現代化有通性，就承認了現代性有可以普適的一面；承認現代化有特性，就不得不承認現代性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從而現代化表現為不同的模式。嚴既澄認為，我們如今只有先集中精力於建設方法的現代化，不管甚麼制度文物，只要是力量做得到的，便應當毫無顧忌地勇往直前去學習人家。經過現代化之後，原有的種種特質可以與新的並行不悖的，讓它去並行，與新的相衝突的，便以新的代舊的。由此看來，嚴既澄所謂的「現代化」又並不同於「西化」，而只是等同於「現代化」可以普適的一面。當然，嚴既澄是認為西方的現代化基本上具有普適價值。<sup>60</sup>

熊夢飛認為中國的現代化，無疑地為吸取所謂西洋文化，只有吸取西洋文化，才能使中國現代化，才能使中國在現代化的世界裏生存下來。這是幾乎近代以來國人的共識。但是，全盤吸收乎？局部吸收乎？吸取根本乎？吸取枝葉乎？曾經過學者們無數次的爭論，至今還沒有獲得一個定論。熊夢飛提出了中國現代化的四大原則：第一是「全盤的吸取西洋文化之根本精神」；第二是「局部的吸取西洋文化之枝葉裝飾」；第三是「運用西洋文化根本精神，調整中國固有之優美文化，剔除中國固有之毒性文化」；第四是「中西文化動向一致的條件下，保留中國民族特徵，加以中國民族創化，成為一種新文化」。關於西洋現代文化的根本精神，熊夢飛的解釋是「科學化的學術思想、機械化的工業與農業和民主化的政治社會與家庭組織」。熊夢飛把他關於中國現代化的四大原則稱之為「西學為體，中學為用」，與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恰恰相反。熊夢飛批評「本位派」把歐美文化看作「乾兒子」或「入贅婿」，而視中國文化為「親生骨肉」。他的結論是：中西文化過去並無截然鴻溝，將來趨於渾然一體；中西舊無所謂「本位文化」，將來亦設難建新的「本位文化」；中國將在遵循四大原則下實現現代化。<sup>61</sup>

胡適本來是主張「全盤西化」的，他早在1929年在《中國基督教年鑒》發表的〈中國文化的衝突〉一文裏就提出了「全盤西化」的主張，在1935年3月31日在《獨立評論》發表的〈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又一次重申了他的「全盤西化」主張。但在與「本位派」的論戰過程裏，胡適覺察出了提倡「全盤西化」的諸多弊端和不周延之處。因此他表示誠懇地向各位文化討論者提議：為避免許多無謂的文字上或名詞上的爭論起見，與其說「全盤西化」，不如說「充分世界化」。「充分」作數量上即是「盡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胡適提出修正的理由有三：第一，避免了「全盤」字樣，可以免除一切瑣碎的爭論；第二，避免了「全盤」字樣，可以容易得著同情的贊助；第三，數量上嚴格的「全盤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文化只是人民生活的方式，處處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經濟狀況和歷

史習慣的限制，這就是文化惰性。況且西洋文化確有不少的歷史因襲的成分，我們不但理智上不願採取，事實上也決不會全盤採取。<sup>62</sup>

總的來說，「西化派」「異變」的趨勢是：第一，由「全盤西化」趨向於「根本西化」、「大部分西化」、「從根上西化」、「從基礎上西化」、「充分西化」、「盡量西化」、「更深刻更廣泛地西化」、「充分世界化」、「一心一意地現代化」等觀點，並主張以「現代化」取代容易引發爭議的「全盤西化」；第二，「西化派」逐漸認識到現代化過程中保持國家認同和民族文化認同的重要性，對民族文化的社會整合力量有了更多的理解，對本國固有的民族文化的優缺點也能夠進行一定的分梳，因而主張在國家「西化」的過程中還要盡量保持民族文化認同，越來越不主張犧牲民族的自尊和自信，而堅決認同要保存和弘揚「固有的優美文化」；第三，「西化派」在與「本位派」論戰過程中逐漸加深了對西洋文化的理解，開始對西洋文化進行仔細的分梳，由被「本位派」指責的「皮毛西化」、「籠統西化」<sup>63</sup>趨向於「實質西化」、「根本西化」和「全盤吸收西洋文化之根本精神」；第四，在文化選擇的理論支援方面，「西化派」的大多數逐漸放棄了支撐「全盤西化」的「文化單位不可分割論」（又稱「單位定命論」）和「自然折衷論」，而趨向「理性選擇論」，「理性選擇論」更多地得到「西化派」和「本位派」的共同認同，「批判性西化」、「選擇性西化」、「主動性西化」取代了「接受性西化」、「機械性西化」、「被動性西化」。

## （二）「本位派」的異變

同樣，「本位派」在與「西化派」論戰的過程中，也修正了自己的一些論點，尤其是補充和完善了基本主張，論戰的過程促使「本位派」不斷地分化和異變。

發表「宣言」的十教授，在面對「西化派」、「本位修正派」和其他人的批評時，最後不得不對自身的主張作進一步的闡明和擴充，因而有所謂「總答覆」的出台。在「總答覆」裏，「本位派」的觀點與「西化派」儘管仍然有分歧，但只是反對「全盤西化」而並不反對「西化」，相反，對守舊表示堅決的決裂和反對。「本位派」在事實上與「西化派」進一步靠攏。「本位派」不主張復古，認為：「復古的企圖不但是抱殘守闕，簡直是自覓死路！我們倘認現代的中國人不容再營封建的生活，那就不應當持保守的態度來阻止文化的演進，還必須扶著時代的大輪，努力踏上日新又新的前程。」「本位派」也不主張全盤西化，表示：「外來文化果足為我們營養的資料，自當盡量吸收，但必須根據此時此地的需要，加以一番審慎的選擇，倘不顧時地的條件，貿然主張全盤西化，豈但反客為主，直是自甘毀滅！況且，西方現存文化的自身，也何嘗是個統一的整體？所謂承受全盤，究竟承受甚麼東西？」在「復古」與「西化」方面，「本位派」的結論是：「我們深知文化不和時代的需要結合，固會發生時代的錯誤，文化（不）適應地域的條件，也會發生地域的齟齬。現代的中國人既不容迷戀過去的殘骸，也不容崇拜異地的偶像。」<sup>64</sup>

關於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如何對待中國傳統和西方文化方面，主張「建設中國本位文化之前得先建設中國本位意識」的劉絜敖提出了一個「不獨化；不同化」的原則。「不獨化」，這是說「我們應該了解世界生活和世界文化的相關性，不可閉關自守的企求復古」；「不同化」，這是說「我們應該尊重我們獨立自尊的文化與民族，不可在與歐美文化接觸之時，便為歐美文化所同化。」這個「不獨化；不同化」的原則與十教授主張的「在縱的方面不主張復古，在橫的方面不主張全盤西化」<sup>65</sup>的原則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劉絜敖「誓死地反對」復古，也「驚奇地看待」全盤歐化。他表示：不顧世界實情，一味主張復古的人，不消說我們

是誓死地反對；就是完全忘了自己，而主張全盤接受歐化的人，我們亦不能不表示驚奇！我們並不是歐美文化體下的附庸！我們自有我們自己獨立發展文化的使命！我們本來是有定型文化的民族，並非其他無文化民族之可以全盤接受外化者可比！我們吸收歐美文化，只為補我們固有文化之不足，所以我們雖可大量吸收歐美文化，但吸收過來，我們即須使其立刻中國化！我們不願生吞！我們不願活剝！我們不願在我們的腹內，有一個可以頑梗致命的怪東西！我們更不願我們吃了這個怪東西後，我們就根本化體為白皮色的歐美人！我們始終是中國人，我們是有我們獨立自尊的人格！<sup>66</sup>

大體而言，「本位派」「異變」的趨勢是：第一，由「中國文化本位」趨向於「中國本位」（「中國民族本位」或「中國國家本位」），反對「中國文化本位」，認為中國固有文化不見得都有保存的價值。一切文化建設都須以中國這個國家有機體的利益為前提，切實關注中國「此時此地的需要」；第二，與「國粹派」、「中體西用派」拉開了距離，劃清了界線，堅決反對文化復古主義或者說文化原教旨主義，認識到復古的企圖不但是抱殘守缺，簡直是自覓死路。「我們的文化建設方針之一，應是不守舊，對於任何復古的企圖，都採取排斥的態度」<sup>67</sup>；第三，由空洞抽象的口號和宣言趨向於務實和應時的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主張；第四，由注重文化的現代化建設趨向於全面的現代化建設。第五，加深了對西洋文化的認識，主張中國急需「採納西洋的優美文化」，從而與「西化派」的主張漸趨一致，對現代化的基本內涵「科學化」、「工業化」、「民主化」完全認同。第六，主張繼續新文化運動的精神，更深刻更廣泛地進行「新啟蒙運動」或「新文化運動」，總的趨勢是由偏於保守走向更加開放，由注重民族情感調整為更加關注民族復興。

### （三）「共識」的養成

「本位派」、「西化派」雙方在論戰的過程中，既不斷批評對方的主張，更加清晰地闡明自己的意見，又吸收對方觀點的合理之處，調整和修正自己的看法。這樣，雙方的觀點越來越明朗化，漸漸形成了關於「現代化」的共識。不僅如此，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們自覺意識到形成「共識」的必要性。陳序經就認為「本位」與「西化」的論戰在於求得「最低限度的共同信仰」或「相當的共同信仰」。<sup>68</sup>

「本位派」和「西化派」的共識主要表現在：第一，都著眼於中華民族的復興和未來發展。第二，由空洞的、抽象的、大而無當的概念爭論進入務實的、具體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現代化方案的論證。第三，能夠認識到西洋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各有其優美之處和不足之處，不再全盤地、輕易地、簡單地加以肯定或加以否定。第四，都主張繼續「新文化運動」的精神，繼續推進「新啟蒙運動」，對西洋的優美文化要盡快引進和完整了解，對西洋文化的根本精神要全盤掌握和盡量吸收，對中國民族文化傳統要接續，對民族文化精神要認同。第五，對現代化的基本指標和主要領域有了共同的認同，都把「科學化」、「工業化」、「民主化」視為現代化最重要的和最基本的指標。不過，陳來認為以「民主」與「科學」為判斷現代化和文化價值的基本座標，一方面表現了近代中國知識份子追求民主與科學的渴望，另一方面也表現了近代中國知識份子對文明發展和現代化過程的誤解。<sup>69</sup>

## 五 幾點思考

中國文化向何處去？中國文化該如何建設？這是十九世紀中期以來一直困擾中國社會各界，



尤其的知識界的一大課題。圍繞對這個社會文化大課題的解答，中國社會各界展開了長期的論爭。由於中國近代嚴峻的民族危機，文化與政治不期然地糾纏在一起，「現代與傳統」、「西方與中國」、「激進與保守」、「進步與落後」、「革命與反動」等兩分性的分析方法左右了中國知識界的思維，並且「現代」、「西方」、「激進」、「進步」、「革命」以及「傳統」、「中國」、「保守」、「落後」、「反動」等概念往往被視為基本可以等同或互換的概念。觀照30年代的「西化」與「本位」的大論戰可窺其一斑。

論戰雖然塵封在歷史的深處，但其深刻的歷史啟迪卻對今天的現代化建設有莫大的價值。如何認識30年代的這場論戰在中國思想史、中國文化建設史、中國現代化史乃至世界現代化史上的地位與意義，學者們有不同的理解和解答。

對「全盤西化」和「中國本位」論戰的觀察，目前主要的分析工具有余英時的「激進與保守」分析法，張灝的「大革命與小革命」分析法、許紀霖的「烏托邦社會工程與零星社會工程」分析法和盛邦和的「解體與重構」分析法等。其中余英時的「激進與保守」分析法在90年代初激起了中國知識界的同情、反思和論戰。

根據余英時的「激進與保守」<sup>70</sup>分析法，「五四」以前的中國思想界是保守主義佔據主流，而此後則是激進主義的世界。在激進主義左右中國社會思潮以來，「以主流思想界而論，他們大致都認定中國文化是阻礙現代化的。甚麼是現代化？這要到1950年以後在西方才有較嚴肅的討論。不過「現代化」這個概念是存在的，這就是中國人基本上承認世界文化只有一個模式，而這個模式最先進的表現就是西方。」<sup>71</sup>余英時強調，中國近現代「思想衝突的焦點正在傳統與現代之間，而以中國文化代表傳統，以西方文化代表現代。因此一個人是保守還是激進，並不在於他對現狀的態度（因為人人都是否定現狀的），而是取決於他對中國文化傳統的看法。」<sup>72</sup>「全盤西化」論當屬極端的激進主義，此外的「西化論」都是「大部分西化論」或「根本上西化論」，而它們也可劃入激進主義的行列。「中國本位」論是溫和的保守主義，復古主義才是極端的保守主義。近代的「中體西用論」、「國粹國光論」、「新儒家」一概是保守主義，但都不是極端的保守主義，而是開放的保守主義。在余英時的「激進與保守」的座標上，30年代的「西化」與「本位」的論戰裏，余英時對「西化」派的評價是不高的。當然余英時並沒有主觀地貶低「西化」派，而是從歷史事實出發，認為這是因為中國沒有一個現狀可以給保守者說話的餘地。也正因為如此，余英時認為中國的保守派與激進派之間沒有一個共同的座標，因此雙方就永遠不能有真正的對話。<sup>73</sup>姜義華不贊成余英時用「激進主義」和「保守主義」這兩個概念來涵蓋太多的東西，更不同意余英時盡量美化所謂「保守主義」而盡量醜化所謂「激進主義」。他強調：二十世紀以來，在中國佔有主導地位的既不是「激進主義」，也不是「五四」精神，而恰恰是「保守主義」。<sup>74</sup>陳來在一定程度上呼應了余英時對激進主義的評價，與余英時一樣，陳來也認為，「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文化運動是受激進主義所主導的」。從「五四」到「文革」是具有繼承性的。以西方文明優於東方文明，以傳統與現代水火不容，要求徹底打倒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激進主義，就其出發點和根本觀念來說，主要有三點：第一，強烈的政治指向；第二，以富強為判准的功利主義；第三，以科學民主排斥其他文化價值的信念。這三點幾乎成了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完全認同的普遍觀念。<sup>75</sup>王元化也不認為「五四」時期形成的對待西學的態度和吸收西學的方式都是天經地義、不可更改的。他說，那時以西學為座標（不是為參照系）來衡量中國文化，是和國外那時盛行的西方文化中心論有著密切關係的（五四時期陳獨秀即稱西學為「人類公有之文明」）。<sup>76</sup>

張灝區分近代以來的世界革命為「大革命」與「小革命」。「大革命」即「社會革命」，它不僅要以暴力改變現成的政治秩序，而且要以政治的力量很迅速地改變現成的社會和文化秩序。「小革命」只是「政治革命」，它是指以暴力推翻或奪取現有政權，而達到轉變現成的政治秩序為目的的革命。<sup>77</sup>「全盤西化」論屬於「大革命」的範疇，它的目標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秩序的根本變化，以西方的現代化模式完全取代中國傳統的社會秩序。「中國本位」論主張「不守舊，不盲從」，從中國「此時此地的需要」出發，對中國社會實行「創造性」改造，他們反對完全推翻傳統，全盤學習西方，故應屬「改革」範疇。張灝認為籠罩二十世紀中國大部分時間裏的是「革命思想道路」。它是從一百年前的改革思想分化出來，在轉型時代（1895-1920）逐漸演化為革命崇拜心態的。張灝認為中國特殊的近代形勢造就了中國特有的「大革命」傳統。張灝對「大革命」傳統和「革命思想道路」並不認同，他是贊成「改革思想道路」的。基於對「革命思想道路」的反思，張灝提醒當前的改革者不要忘記歷史，否則勢必重蹈覆轍。

許紀霖不贊成用「激進與保守」分析法來分析近代中國社會變革的價值取向<sup>78</sup>，他說，與其用激進與保守這類語意含混，所指滑動的概念，不如借助卡爾·波普的兩種社會改造工程分析模型更清晰一些。二十世紀中國的癥結恰恰在於，那種整體主義的烏托邦改造工程太強大了，主宰了整個中國思想界和社會政治實踐，以致於自由主義的漸進改造工程完全失去了對它的制衡能力，使得中國的變革就如走馬燈一般，方式一個比一個更極端更激進，目標一個比一個更浪漫更空渺。<sup>79</sup>「五四」時代的「全盤西化」論無疑屬於激進的整體主義的烏托邦改造工程。激進顛峰過後，從二三十年代起中國思想界峰回路轉，主導價值取向開始趨於溫和化。要求西化的知識份子在思想激進的過程中遇到了幾乎是難以逾越的四重屏障：首先是虔誠仿效西方與發現西學「破產」的困惑；第二是全盤實現西化與西學多元取向的困惑；第三是理智接受西方與情感面向本土的困惑；最後是拯救民族危機與文化出現「真空」的困惑，在此思想與心理背景下，許多知識份子開始重新認識中國文化的價值，試圖在融和本土和外來思想資源的基礎上實現文化的重建。在30年代中期的中國本位文化討論中，繼續主張「全盤西化」或「充分世界化」的激烈聲音轉為微弱，相反，「不守舊，不盲從」，「使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能恢復過去的光榮」，這類中國本位主張卻得到了大部分討論者的認同。<sup>80</sup>許紀霖不贊成全盤的天翻地覆的烏托邦社會改造工程，而主張零星的漸進的經驗性社會改造工程，對「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給予了更多的理解。李澤厚也持同樣的態度，他強調：「烏托邦」的整體社會工程設計一定會導致災難，相反，根據經驗出發來不斷修改、不斷探索的前景，反而比較可靠。<sup>81</sup>

盛邦和從「解體與重構」的分析方法出發，認為「解體」派與「重構」派構成了中國文化的現代化建設的雙重變奏，二者不是絕然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成的，正是他們的協作，才奏出了中國文化建設的和美音符。「解體」派以「西學」作武器去解構「中學」，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猛烈轟擊，以為新文化催生。「重構」派以「中學」為本位去吸納「西學」，從事中國文化的艱難接續和現代性更新。「解體」派與「重構」派幾乎同時出現在中國文化現代化的歷史起點上。從1927年到1949年，從總體上看，這時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解體」和批評聲浪已經削弱，雖然還有因陳序經發表《中國文化的出路》而引發「中國本位」與「全盤西化」的再次論戰，但西學派已是強弩之末，「重構」與「接續」中國文化的觀點已經普及於世。「建設派」已經從後台轉向前台，由弱勢漸趨強勢。更新傳統，對中國文化作體系式的詮釋與重構的工作已經開始。<sup>82</sup>盛邦和對「中國本位」論再三致意，認為它對中華民族的認

同凝聚和新文化建設厥功甚偉。所謂「中國本位」，即承認中國文化的主體地位，在此基礎，吸收西學，推進文化建設。中西方文化歷來對立統一，現代中國文化建設重要的話題就是如何擺正「西學」與「中學」在文化新組合中的各自地位。中學派堅持中國本位，並在民族史論中將此觀點作充分闡揚。盛邦和從民族史學的視野對「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理論進行了新的詮釋，他說，本位運動雖發起於上世紀30年代，然而類似這樣的思想，早在上世紀初，就有章太炎等人以「國粹」名義首倡。由「國粹國光」論到「文化民族」論，而至於「中國本位」論，再加上民族史學特有的「人生心靈」論，可以縱覽中國民族史觀的前行道路。中國民族史家先後提出「國粹國光」論——「人生心靈」論——「文化民族」論——「中國本位」論，這樣四個前後相續的理論，而這四個理論依然可以用「中國本位」論統一名之。「國粹國光」論是這個理論的首發與開端；「文化民族」論與「人生心靈」論則是這個理論的闡發與發展。而當「中國本位」論一旦面世，民族史學理論的完整邏輯架構也終告成。<sup>83</sup>

從以上四種分析工具對「全盤西化」和「中國本位」論戰的觀察來看，「全盤西化」無疑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質疑和否定，而「中國本位」則被給予更多的同情和理解。當然他們都是從歷史的事實出發對「全盤西化」和「中國本位」論進行深刻的反思，他們質疑「全盤西化」論，是因為歷史發展的路向是能動的，而並不是處處都只有付之於歷史的必然性。

「全盤西化論」往往與「全盤否定中國民族文化」為一體兩面。對中國文化抱著極其嚴峻的態度，不加分梳地認為它是阻擋中國繁榮富強和實現現代化的罪魁禍首。要求中國傳統文化承擔中國衰弱落後的全部責任。關於「全盤西化論」，從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上看，有過三次高潮。第一次是二十世紀20年代前後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時期，以陳獨秀、胡適、魯迅、錢玄同、吳虞等為代表，「打倒孔家店」、「推倒吃人禮教」、「擁護德先生和賽先生」（此外還有更極端的如「廢除漢字」、「改良人種」）等為當時主要主張。第二次是二十世紀30年代的「全盤西化」與「中國本位」的大論戰，以胡適、陳序經、梁實秋等為代表，主張「全盤西化」或「充分世界化」，即「一心一意的現代化」，是中國惟一的現代化選擇，堅決反對所謂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第三次是二十世紀60年代的台灣和80年代的大陸，台灣以「《自由中國》派」為代表，包括胡適、雷震、殷海光等，大陸以「《河殤》派」為代表，向往「藍色文明」，否定「黃色文明」，主張走「民主自由之路」。

「中國本位論」則要求對中國文化要有「同情地理解」，反對「抹黑」和「切斷」中國傳統，主張「接續中國傳統文化」，實現「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他們不反對「西學」，力主中西文化的「和合」「調適」。「五四」以前的「中體西用」論和「國粹國光」論，無疑是「中國本位論」的萌發和前驅，「五四」以來的「接續」論、「調適」論、「文化民族」（或「文化中國」）論、「創造性轉化」論、「和合」論等一概是「中國本位論」的發展與提升。

「全盤西化論」與「中國本位論」處於中國文化「破壞主義」與「建設主義」的兩端，對中國文化都有淘洗披揀的價值，一個「破舊立新」，一個「推陳出新」；一個「拿來」，一個「消化」；一個「解構」，一個「建構」<sup>84</sup>。兩者的互動構成中國文化建設的獨特風景。不過，誠如余英時所言，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之間並不存在制衡。這是由嚴酷的中國社會現狀形成的。固然這是中國現代文化建設的最大遺憾，也是中國現代化建設不同於歐美的獨特性。

30年代「全盤西化」與「中國本位」論戰的硝煙已經散盡，但是「全盤西化」與「中國本

位」論爭的形勢卻反覆地出現，困擾著我們的思維和現代化建設。我們還處在「社會大轉折」的時代，中華文明自身現代化的任務還沒有完成，我們究竟能不能夠走出「激進」和「革命」的怪圈？這是擺在中國知識界的一項嚴峻又嚴肅的課題。由於現在我們還有可以信賴的現狀可守，誠如姜義華的「新理性主義」<sup>85</sup>所主張的：中國完全能夠以一種吸收了現代文明各種積極成果的新理性主義，來解決好社會大轉折中出現的諸多失序、失衡和失範的問題，實現使中華文明自身現代化的目標。<sup>86</sup>

## 註釋

- 1 參考陳序經：〈從西化問題的討論裏求得一個共同信仰〉，《獨立評論》（1935年），第149號。
- 2 參考穆超：〈再論「全盤西化」〉，廣州《民國日報》，1934年7月10日。見羅榮渠主編：《從「西化」到現代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385頁。
- 3 參考梁實秋：〈自信力與誇大狂〉，《文化建設》（1935年），第1卷第10期。
- 4 參考嚴既澄：〈「我們的總答覆」書後——向「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的十位起草者進一言〉，天津《大公報》，1935年5月22-23日。
- 5 參考張佛泉：〈西化問題之批判〉，天津《國聞周報》（1935年4月），第12卷第12期。
- 6 參考張熙若：〈全盤西化與中國本位〉，天津《國聞周報》（1935年4月），第12卷第23期。
- 7 參考熊夢飛：〈談「中國本位文化建設」之閑天〉，《文化建設》（1935年），第1卷第9期。
- 8 參考胡適：〈文化的衝突〉，《中國基督教年鑒》1929年英文版。
- 9 參考陳序經：〈中國文化之出路〉，廣州《民國日報》，1934年1月15日。
- 10 參考胡適：〈文化的衝突〉，《中國基督教年鑒》1929年英文版。
- 11 吳景超認為胡適「對於東西文化的保存和採用，採取一種折衷的態度」。可參考吳景超：〈建設問題與東西文化〉，《獨立評論》（1935年），第139號。
- 12 胡適自述吳景超和陳序經把他列入「文化折衷派」，參考適之：〈編輯後記〉，《獨立評論》（1935年），第142號。
- 13 適之：〈編輯後記〉，《獨立評論》（1935年），第142號。
- 14 胡適：〈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天津《大公報》，1935年6月21日。
- 15 胡適：〈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天津《大公報》，1935年6月21日。
- 16 胡適：〈答陳序經先生〉，《獨立評論》（1935年），第160號。
- 17 胡適是主張「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胡適認為新文化運動的「唯一目的是再造文明」。由此可知胡適並非一個純然的傳統文化「破壞主義者」，「再造中華民族的新文明」是胡適從事「新思潮運動」的真正趣意所在。當然胡適是主張「不破不立」的，「破壞」是其中的必然階段和必要手段。參考胡適：〈新思潮的意義——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新青年》（1919年12月1日），第7卷第4號。
- 18 參考陳序經：〈中國文化的出路〉，廣州《民國日報》，1934年1月15日。
- 19 參考胡適：〈文化的衝突〉，《中國基督教年鑒》1929年英文版。胡適對中日「西化」和「現代化」的分析在抗日戰爭時期發生了重大變化。胡適不再對日本「西化」和「現代化」的成就盲目推崇，對中日「西化」和「現代化」的優缺點開始進行冷靜的比較性反思和分析。胡適區分中日西化和現代化為兩種不同的類型，認為中國的西化和現代化是「自由主義的」、「長久暴露的」、「漸進的」、「自然而然的」、「政治優先的」；而日本的西化和現代化是「軍國

- 主義的」、「選擇性的」、「中央統制型的」、「保護性的」、「經濟優先的」。日式現代化的優點是「快速的」、「有秩序的、經濟的、繼續的、安定和有效的」。缺點是「對人民的嚴密控制」和「對傳統的嚴加保護」。中式現代化的優點是「自願的」、「逐漸普及和同化的」、「完全民主化的」。缺點是「又緩慢又費力的」、「零落的」。參考胡適：〈中國和日本的西化〉和〈中國與日本的現代化運動——文化衝突的比較研究〉，前者見《美亞雜誌》（1938年），第2卷第5期。後者係胡適應美國歷史學會之邀於1939年12月29日在美國所做的演講。均收入《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5冊。
- 20 參考陳序經：〈中國文化之出路〉，廣州《民國日報》，1934年1月15日。以及陳序經：《中國文化的出路》，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
- 21 參考穆超：〈再論「全盤西化」〉，廣州《民國日報》，1934年7月10日。
- 22 參考張東蓀：〈現代的中國怎樣要孔子〉，《正風》（1935年），第1卷第2期。
- 23 參考吳景超：〈建設問題與東西文化〉，《獨立評論》（1935年），第139號。
- 24 參考陳石泉：〈中國文化建設的動向〉，天津《大公報》，1935年3月13-21日。
- 25 參考陳立夫：〈文化與中國文化之建設〉，《文化與社會》（1935年），第1卷第8期。
- 26 常燕生：〈我對於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的簡單意見〉，《文化與教育》（1935年），第55期。
- 27 太虛：〈怎樣建設現代中國的文化〉，《文化建設》（1935年），第1卷第9期。
- 28 參考劉絜敖：〈中國本位意識與中國本位文化〉，《文化建設》（1935年），第1卷第9期。
- 29 參考丁遙思：〈論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文化批判》（1935年），第3卷第1期。
- 30 參考張申府：〈論中國化〉，重慶《戰時文化》（1939年），第2卷第2期。
- 31 李麥麥認為：「中國文化建設的原則，決定於中國經濟建設的原則。中國經濟建設的原則，則決定於中國歷史發展的邏輯進程。」他認為現階段「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就是「中國的資本主義文化建設」。參考〈資本主義文化與社會主義文化討論〉（專欄），《文化建設》（1935年），第1卷第7期。
- 32 參考王新命等十教授：〈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文化建設》（1935年），第1卷第4期。
- 33 王新命等十教授：〈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文化建設》（1935年），第1卷第4期。
- 34 王新命等十教授：〈我們的總答覆〉（1935年），《文化建設》第1卷第8期。
- 35 參考王新命等十教授：〈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文化建設》（1935年），第1卷第4期。
- 36 參考王新命：〈全盤西化論的錯誤〉，《晨報》，1935年4月3日。以及穆超：〈再論「全盤西化」〉，《民國日報》（廣州），1934年7月10日。
- 37 參考洛甫（張聞天）：〈抗戰以來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運動和今後任務〉，《中國文化》（1940年），第2期。
- 38 文化的「自然折衷」論的著名提出者是胡適，他在1935年3月發表在《獨立評論》第142號的〈編輯後記〉裏談到：文化自有一種「惰性」，全盤西化的結果自然會有一種折衷的傾向。全盤接受了，舊文化的「惰性」自然會使它成為一個折衷調和的中國本位新文化。我們不妨拼命地走極端，文化的惰性自然會把我們拖向折衷調和上去的。同年3月31日發表在《獨立評論》第145號的文章〈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有一段話就對這一理論進行了更清晰的表述：「中國舊文化的惰性實在大的可怕，我們正可以不必替『中國本位』擔憂。我們肯往前看的人們，應該虛心接受這個科學工藝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後的精神文明，讓那個世界文化充分和我們的老文化自由接觸，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氣銳氣來打掉我們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氣。將來文化大變動的結晶品，當然是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那是毫無可疑的。」
- 39 參考張佛泉：〈西化問題之批判〉，天津《國聞週報》（1935年4月），第12卷第12期。

- 40 參考張熙若：〈全盤西化與中國本位〉，天津《國聞周報》（1935年4月），第12卷第23期。
- 41 參考梁實秋：〈自信力與誇大狂〉，《文化建設》（1935年），第1卷第10期。
- 42 參考賀麟：《文化與人生》，商務印書館1947年版。
- 43 參考葉青：〈全盤西化？殖民地化？〉，上海《申報》，1935年6月22日。
- 44 參考適之：〈編輯後記〉，《獨立評論》（1935年），第142號。
- 45 參考胡適：〈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獨立評論》（1935年），第145號。
- 46 參考張佛泉：〈西化問題之批判〉，天津《國聞周報》（1935年4月），第12卷第12期。
- 47 參考張佛泉：〈西化問題之批判〉，天津《國聞周報》（1935年4月），第12卷第12期。以及參考梁實秋：〈自信力與誇大狂〉，《文化建設》（1935年），第1卷第10期。
- 48 參考張熙若：〈全盤西化與中國本位〉，天津《國聞周報》（1935年4月），第12卷第23期。
- 49 參考熊夢飛：〈談「中國本位文化建設」之閑天〉，《文化建設》（1935年），第1卷第9期。
- 50 參考嵇文甫：〈漫談學術中國化問題〉，《理論與現實》（1940年），第1卷第4期。
- 51 參考洛甫（張聞天）：〈抗戰以來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運動和今後任務〉，《中國文化》，1940年第2期。
- 52 參考吳景超：〈建設問題與東西文化〉，《獨立評論》（1935年），第139號。
- 53 參考陳石泉：〈中國文化建設的動向〉，天津《大公報》，1935年3月13-21日。
- 54 參考常燕生：〈我對於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的簡單意見〉，《文化與教育》（1935年），第55期。
- 55 參考劉絜敖：〈中國本位意識與中國本位文化〉，《文化建設》（1935年），第1卷第9期。
- 56 參考丁遙思：〈論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文化批判》（1935年），第3卷第1期。
- 57 參考賀麟：〈文化與人生〉，商務印書館1947年版。
- 58 參考張熙若：〈全盤西化與中國本位〉，天津《國聞周報》（1935年4月），第12卷第23期。
- 59 參考陳序經：〈從西化問題的討論裏求得一個共同信仰〉，《獨立評論》（1935年），第149號。以及陳序經：〈全盤西化的辯護〉（1935年），《獨立評論》第160號。
- 60 參考嚴既澄：〈「我們的總答覆」書後——向「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的十位起草者進一言〉，《大公報》（天津），1935年5月22-23日。
- 61 參考熊夢飛：〈談「中國本位文化建設」之閑天〉，《文化建設》（1935年），第1卷第9期。
- 62 參考胡適：〈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天津《大公報》1935年6月21日。
- 63 參考張佛泉：〈西化問題之批判〉，天津《國聞周報》（1935年4月），第12卷第12期。
- 64 王新命等十教授：〈我們的總答覆〉，《文化建設》（1935年），第1卷第8期。
- 65 王新命等十教授：〈我們的總答覆〉，《文化建設》（1935年），第1卷第8期。
- 66 參考劉絜敖：〈中國本位意識與中國本位文化〉，《文化建設》（1935年），第1卷第9期。
- 67 王新命等十教授：〈我們的總答覆〉，《文化建設》（1935年），第1卷第8期。
- 68 參考陳序經：〈從西化問題的討論裏求得一個共同信仰〉，《獨立評論》（1935年），第149號。
- 69 參考陳來：〈20世紀文化運動中的激進主義〉，李世濤主編：《知識份子立場：激進與保守之間的動蕩》，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297頁。
- 70 何謂「激進與保守」？余英時認為，激進與保守是相對於現狀而言的，最簡單地說，保守就是要維持現狀，不要變；激進就是對現狀不滿意，要打破現狀。要打破現狀的人，我們常把他放在激進的一方面，要維持現狀的人，我們把他放在保守的一方面。保守與激進都有不同的程

度，在保守與激進之間可以有不同程度的立場。從近代中國的思想界來看，有保守的激進主義，如自由主義，有激進的激進主義，如民族虛無主義或文化虛無主義；也有激進的保守主義，如復古主義或原教旨主義，保守的保守主義，如「中國本位論」。參考余英時：〈中國近代史上的激進與保守〉，李世濤主編：《知識份子立場：激進與保守之間的動蕩》，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3頁。下同。

- 71 余英時：〈中國近代史上的激進與保守〉，《知識份子立場：激進與保守之間的動蕩》，第14頁。
- 72 余英時：〈中國近代史上的激進與保守〉，《知識份子立場：激進與保守之間的動蕩》，第21頁。
- 73 參考余英時：〈中國近代史上的激進與保守〉，《知識份子立場：激進與保守之間的動蕩》。
- 74 參考姜義華，陳炎：〈激進與保守：一段尚未完結的對話〉，以及姜義華：〈20世紀中國思想史上的政治保守主義〉，《知識份子立場：激進與保守之間的動蕩》。
- 75 參考陳來：〈20世紀文化運動中的激進主義〉，《知識份子立場：激進與保守之間的動蕩》第297頁。
- 76 參考王元化，李輝：〈對於五四的再認識答客問〉，《知識份子立場：激進與保守之間的動蕩》，第273頁。
- 77 參考張灝：〈中國近百年來的革命思想道路〉，《知識份子立場：激進與保守之間的動蕩》，第42頁。
- 78 許紀霖認為，當我們將「保守主義」作為分析工具，用來具體闡釋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的各個層面的現象時，必須將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與政治上的保守主義嚴格分開，因為它們各自所憑藉的座標是不同的。所謂文化層面的激進或保守，主要取決於對中國文化傳統的價值取向，主張全盤推倒的是為激進，而文化闡釋仍然固守在本土文化框架內的是為保守。所謂政治層面的激進或保守，主要看其對現實社會政治秩序的認同態度，要求根本解決、推倒重建一個新的是為激進，主張在現成系統內作技術性調整和修補的是為保守。參考許紀霖：〈激進與保守之間的動蕩〉，《知識份子立場：激進與保守之間的動蕩》，第37頁。
- 79 參考許紀霖：〈激進與保守之間的動蕩〉，《知識份子立場：激進與保守之間的動蕩》，第40頁。
- 80 參考許紀霖：〈激進與保守之間的動蕩〉，《知識份子立場：激進與保守之間的動蕩》，第39頁。
- 81 李澤厚、王德勝：〈關於文化現狀、道德重建的對話〉，《知識份子立場：激進與保守之間的動蕩》，第74頁。
- 82 參考盛邦和：《解體與重構——現代中國史學與儒學思想變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頁。
- 83 參考盛邦和：〈文化民族主義的三種理論——民族史學的視野〉，《思想與文化》，第3期。
- 84 關於20世紀中國文化的「解構」與「建構」，參看盛邦和：《解體與重構——現代中國史學與儒學思想變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 85 姜把「新理性主義」概括為四個「並行不悖，相礪相長」：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個性化精神與整體化精神；戡天役物的競爭精神與自然諧適的保守精神；世界化精神與本土化精神。強調：在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間建立起良性的互動關係，將會推動世界上所有文明之間良性互動關係的建立和發展。參考姜義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和平革命與新理性主義〉，《知識份子立場：激進與保守之間的動蕩》。
- 86 參考姜義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和平革命與新理性主義〉。

何愛國 1970年生，江西撫州人，華東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歷史學系博士生

---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三十四期 2005年1月31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三十四期（2005年1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